

文章编号: 1673-0453(2011)03-0001-09

# 略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个人因素

王永平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摘 要:**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除涉及政治、军事、民族融合等诸多客观因素外, 还与孝文帝个人主观因素密切相关,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孝文帝对汉文化的迷恋, 其南征战略及追求正统的心态, 个人生活经历与情感因素等, 都是促使其决意迁都洛阳的内在动因。孝文帝迁都及其全面汉化, 既加快了当时鲜、汉民族上层的融合进程, 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鲜卑迁洛集团与恒、代保守势力的分化, 而南迁集团的不断弱化则加速了北魏统治的衰弱。

**关键词:** 北魏孝文帝; 迁都; 洛阳; 个人因素; 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39.21 **文献标识码:** A

提起北魏孝文帝, 人们无不推崇其厉行全面汉化变革。而考察其汉化举措, 迁都洛阳可谓其中莫大之要害,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 “迁都洛阳乃北魏汉化政策中一大关键。”<sup>[1]40</sup> 对于孝文帝迁都洛阳, 历来褒贬不一, 誉之者以为其顺应了当时民族融合的趋势, 开辟了北魏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贬之者则以为孝文帝此举加剧了鲜卑拓跋部的分化, 加速了北魏的衰亡。评说史事, 裁判人物, 往往歧义纷呈, 难以统一。不过, 像对待北魏孝文帝迁都评价如此对立, 则不多见。北魏孝文帝何以执意迁都, 其影响究竟如何? 以往论者多从汉化趋势等客观方面立论, 但从相关情况看, 孝文帝迁都过程中鲜卑拓跋部内部反对势力极大, 这不能不使我们产生疑问: 如果孝文帝迁都主要是由客观因素所决定的, 当时应能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形成共识, 何以出现鲜卑内部的严重分裂和孝文帝的孤立呢? 当然, 也有论者从孝文帝自身主观方面加以分析, 涉及其文化素养、南征战略与情感因素等, 这对全面、准确理解孝文帝决意迁都深层的、具体的原因, 当不无补益。这方面的看法, 古代史家多为只言片语的零星论述, 现代学者所论则多散见相关论著之中, 似无专文论之, 故本文在前辈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就促成孝文帝迁都的个人因素作一系统论述, 不当之处, 恳请指正。

## 一、对汉文化的迷恋是促使孝文帝迁都的内在动因

相较于以往的北魏统治者, 孝文帝的汉文化修养极为突出。这不仅仅在于其个人的聪明才智, 也与其祖母冯太后的严格教育和督责不无关系。据文献所载, 冯太后延请了一些儒学士大夫教育培养孝文帝, 着力提高他的文化修养。《魏书》卷六二《李彪传》载李彪上表称孝文帝“幼蒙鞠诲”云云, 可以推测孝文帝自幼开始接受儒学启蒙。其实, 冯太后对孝文帝诸弟的教育也十分重视, 《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咸阳王禧传》载冯氏令曰: “自非生知, 皆由学诲, 皇子皇孙, 训教不立, 温故求新, 盖有阙矣。可于闲静之所, 别置学馆, 选忠信博闻之士为之师傅, 以匠成之。”后来孝文帝诸弟的文化修养明显提高, 这与北魏宫廷文化教育环境的改善密不可分。正因为如此, 孝文帝一生都能坚持学习, 具备了良好的学术文化修养。对此, 《魏书》卷七《高祖纪下》载: “(孝文帝) 雅好读书, 手不释卷。《五经》之义, 览之便讲, 学不师受, 探其精奥。史传百家, 无不该涉。善谈《庄》、《老》, 尤精释义。才藻富赡, 好为文章, 诗赋铭颂, 任兴而作。有大文笔, 马上口授, 及其成也,

收稿日期: 2011-04-15

作者简介: 王永平(1962-), 男, 江苏南京人, 扬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六朝历史研究。

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爱奇好士,情如饥渴。待纳朝贤,随才轻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迈,不以世务婴心。”特别在儒学方面,孝文帝具有很高的水平,《魏书》卷八四《儒林传序》载:“高祖钦明稽古,笃好坟典,坐舆据鞍,不忘讲道。”根据相关记载,孝文帝确实曾亲自讲说儒家经典。《魏书·献文六王·彭城王勰传》载:“高祖亲讲《丧服》于清徽堂,从容谓群臣曰:‘彦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纓绂,失过庭之训,并未习礼,每欲令我一解《丧服》。自审义解浮疏,抑而不许。顷因酒醉坐,脱尔言从,故屈朝彦,遂亲传说。将临讲坐,惭战交情。’御史中尉李彪对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讲礼。陛下圣叡渊明,事超百代,臣得亲承音旨,千载一时。’”孝文帝亲自为其兄弟讲说《丧服》,意在培养他们的礼法意识。他能够讲经,说明其修养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又,《魏书》卷七二《阳尼传》载:“时中书监高闾、侍中李冲等以尼硕学博识,举为国子祭酒。高祖尝亲在苑堂讲诸经典,诏尼侍听,赐帛百匹。”孝文帝博通众经,并曾公开讲论。这种良好的汉文化修养,对孝文帝的性格、气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除文化教育之外,冯太后还很重视对孝文帝品德和能力方面的训导。《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载:“太后以高祖富于春秋,乃作《劝戒歌》三百余篇,又作《皇诰》十八篇,文多不载。”所谓《劝戒歌》,是一种以告诫为主旨的歌谣,宣扬儒家的道德说教;而《皇诰》则是仿效《尚书》的文体制作的告诫性文章,冯太后还把高龄的大儒高允请到宫中,对她亲自写的《皇诰》加以修改、润色。高允又受命作《酒训》,列举以往“酒之败德”的相关事例,以劝导孝文帝。对冯太后的抚养与教导之恩,孝文帝曾自述“朕以虚寡,幼纂宝历,仰恃慈明,缉宁四海”,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关于冯太后对孝文帝之教育及其影响,吕思勉先生曾指出:“孝文之为人,盖全出文明太后所卵育,其能令行于下,亦太后专政时威风夙行,有以致之;故后实北魏一朝极有关系之人物也。”<sup>[2]504</sup>又说:“高祖之教育,盖全受诸文明后,与佛狸母虽汉人,教育全受诸鲜卑者大异,此其所以能去腥膻之乡,践礼教之域,毅然独断,大革胡俗欤?”<sup>[2]510</sup>就孝文帝个人学识与品德而言,其汉化程度极深,已远超同时代鲜卑贵族。

孝文帝的汉文化修养与素质,有助于他在亲

政后全面实施汉化。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四“魏孝文帝文学”条中说:“帝深于文学,才藻天成,有不能自讳者,虽亦才人习气,然聪睿固不可及。其急于迁洛,欲变国俗,而习华风,盖发于性灵而不自止也。”所谓孝文帝“急于迁洛,欲变国俗,而习华风,盖发于性灵而不自止也”,是将文化因素作为孝文帝迁都的根本原因。又,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四“魏孝文帝迁洛”条也说:“魏孝文帝以国俗沿上世之陋,欲迁洛以变旧风……盖帝优于文学,恶本俗之陋,欲以华风变之,故不憚为此举也。”赵翼明确指出了孝文帝之超迈时人的汉文化修养对其迁都之直接影响。这是很深刻的论断。确实,孝文帝不仅自己笃好汉族文化,而且希望将鲜卑族与汉族融为一体,加快鲜卑族的汉化进程。据《魏书》卷二一《献文六王传·广陵王羽传》,孝文帝曾对鲜卑人物说:“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朕闻此,深用恍然……朕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孙,博见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由此可见,孝文帝迁都洛阳,目的在于利用汉族文化改变其本族旧俗。

孝文帝迁都洛阳是其实行全面汉化变革的前提。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以来一直定都平城,尽管其间因为饥荒等原因有人提出过迁都的动议,但都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及至孝文帝亲政,北魏立国已近百年,自太武帝统一黄河流域以来,也近半个世纪,如果继续推进北魏的统一大业,自然要进一步南进,将政治中心迁徙到华夏文化故国的中心地,从而实现与中原汉族大族的进一步融合,扩大北魏的社会基础。孝文帝意欲全面汉化,必然将北魏汉化从一般的制度层面推进到文化层面,而文化往往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最后堡垒,这对大多数鲜卑人而言,在感情上是很难自觉接受的,而平城是鲜卑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保守势力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在平城进行全面汉化,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孝文帝曾对任城王元澄说:“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崑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sup>[3]卷一九《任城王澄传》</sup>他认为只有迁都中原,才能深入推行其一系列汉化方略。对此,逯耀东先生曾指出,孝文帝亲政后曾对平城进行改造,并进行了一系列有关礼仪与祭祀问题的讨论与决定,“他最初的希望,只是利用平城现有的基础,将

它转变为一座典型的中华文化式的都城，并没有积极南迁的意念。后来所以匆匆南迁，乃由于北方保守势力，对他所作的改革有一种难以排除的压力。但选择洛阳作为新的都城，却完全表现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并未顾及到现实的问题。”<sup>〔4〕130</sup> 孝文帝选择洛阳为新的都城，其最初的动机是因为“洛阳所表现的文化传统激发而成”，他南征过程中巡幸“洛阳荒芜的旧迹，触发他思古之幽情，最后为了贯彻他文化的理想，决定放弃邺而定都洛阳”<sup>〔4〕132</sup>。可见，孝文帝迁都与择都皆与其文化理想有关。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孝文帝自幼研习汉文化，与一些汉族士人结为宾友，他们对孝文帝的影响很大。特别在谋划迁都问题上，孝文帝信重的李冲、元澄等重臣事先并不知情，逯耀东先生考证后指出，“孝文帝决定定都洛阳的计划，是很突然而机密的，甚至于连当时被视为左右手的元澄、李冲事先都不知道，所以定都与全身披挂准备发兵南征策略的制定，很显然出于另外一批人之手，后来张彝、郭祚、崔光都因‘以参迁都之谋’而进爵。”<sup>〔4〕135</sup> 确实，由于孝文帝的汉文化，其身边形成了一个年轻的汉族士人群体，他们成为影响孝文帝决策的幕后人物。

## 二、“经营江左”与寻求正统的愿望是促使孝文帝迁都的重要助力

自太武帝拓跋焘以来，北魏在军事上已逐渐形成了对南朝的优势地位，并把军事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南朝。孝文帝时，北魏的版图已扩张到淮河一线，南朝在军事上处于守势，孝文帝本身汉文化修养极高，无论是出于正统的观念，还是天下共主的愿望，他都急于迁都。孝文帝一再表达他的这种急切愿望，他曾对出使南齐的卢昶说：“卿便至彼，勿存彼我。密迩江表，不当早晚，会是朕物。”<sup>〔3〕卷四七《卢玄传附卢昶传》</sup> 他对李冲说：“吾方欲经营宇宙，一同区域”，“取南之计决矣，朕行之谋必矣。”<sup>〔3〕卷五三《李冲传》</sup> 又谓北海王元详说：“江吴窃命，于今十纪，朕必欲荡涤南海。”<sup>〔3〕卷二一《北海王详传》</sup> 当有人以为统一时机尚未成熟，主张不要轻举妄动，孝文帝很不以为然，说“奋臂一呼，或成汉业”，“将希

混一，岂好轻动！”<sup>〔3〕卷四七《卢玄传附卢昶传》</sup> 他曾对归降的萧齐南阳太守房伯玉说：“朕承天驭宇，方欲清一寰域”，“天无二日，土无两王，是以躬总六师，荡一四海”。正因为如此，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他先后三次亲率大军南伐。孝文帝既“取南之计决”，便必须将作为统治中心地的都城南迁，以便坐镇指挥，否则远近平城遥控，根本无法具体实施其统一战略<sup>①</sup>。

对孝文帝的这一心态，宋人叶适已有清楚的领会，他在《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四诸条中一再指出孝文帝重用南人王肃，“盖其年相少长，且中以图南之规故也”。又说：“孝文迁洛，不止慕古人居中土，盖欲身在近地，经营江左耳，其与卢昶语可见。”叶适指出了北魏孝文帝出于南征、统一全国的目的而急于迁都的潜在动机。这一看法颇为深刻。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叶适过分强调孝文帝迁都与南征的联系，易于使人将孝文帝“经营江左”之军事目的与其钦慕中原文化两者割裂。笔者认为，孝文帝急于南征，其根本动因还是在于其对华夏文化的钦羨。就中国传统政治文明而言，历代贤能的圣君明主无不追求天下一统，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他们的最高追求。孝文帝既深受传统华夏文化之熏染，在政治上也必然以追求大一统为最高目标。从这一角度看，孝文帝急于迁都以“经营江左”，固然有其兴战求利之军事目的，但根本上说则是其汉化的表现。《魏书》卷五六《郑道昭传》载：

从征沔汉，高祖飨侍臣于悬瓠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焉。乐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歌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骋混江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尊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分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

由此可见，孝文帝与汉族士大夫唱和，汉族士人正是从歌颂儒家先圣的角度来赞美孝文帝的南征军事活动的。

① 关于北魏孝文帝迁都原因，张金龙先生在《北魏政治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之九“孝文帝的迁都与巡察”中以为“向南进攻以实现全国一统是孝文帝迁都的首要原因”（第200—202页），并就此有深入论述。本文有所参考。

孝文帝如此,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并非特例。当时汉化程度高的胡人统治者,其最终都表现出统一南北的愿望,并急于付诸行动,以求成为“正统”。孝文帝之外,前秦统治者苻坚便颇为典型。众所周知,苻坚个人及其苻氏集团代表人物汉化修养甚高,他不顾众人反对,一意孤行,倾全国之力发动旨在灭亡东晋的决战,最终丧师淝水,直接促成了前秦的崩溃。对此,《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历代三》载朱熹师生之间的一段对话曰:

问:“苻坚立国之势亦坚牢,治平许多年,百姓爱戴。何故一败涂地,更不可救?”曰:“他是扫土而来,所以一败更救不得。”又问:“他若欲灭晋,遣一良将提数万之兵以临之,有何不可?何必扫境而来?”曰:“他是急要做正统,恐后世以其非正统,故急欲亡晋。”

朱熹以为苻坚大规模南征,“他是急要做正统,恐后世以其非正统,故急欲亡晋”,根本不顾及具体的军事部署,以致最终崩溃,可谓一言中的。苻坚本人汉化极深,经常与臣属讨论儒家先圣事迹,孝文帝在这方面与之颇为相似,孝文帝曾对反对派说:“代在恒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迁于中原。”<sup>[3]</sup>卷一四《东阳公丕传》九州的内外分别,正是他深受儒家传统正统观念影响的结果。孝文帝内心中仰慕汉文化,已表现出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意识。492年,群臣讨论五行次第,孝文帝采纳汉族士人李彪的建议,认为北魏直承西晋,具有正统的地位。既如此,他必然急于将都城迁到中原地区,而不可能再居于“九州之外”的平城了。

### 三、早年的遭遇与情感因素是刺激孝文帝决意迁都的催化剂

自孝文帝被立为帝,直到太和十三年冯太后去世,他实际上是冯太后手中控制的傀儡。《魏书》卷一三《皇后·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载其“复临朝听政……及登尊极,省决万机……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毫无疑问,冯太后是当时北魏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和决策人,而平城时代的孝文帝则长期充当冯氏的政治工具,诚如李凭先生所说:“临朝听

政将母后权力推上了北魏政治的顶巅,使皇帝站到了陪衬的位置……这段史料反映,文明太后已经俨然成为北魏王朝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了。”<sup>[5]</sup>259-260

不仅如此,冯太后出于巩固其个人权力与家族地位的考虑,对年少的孝文帝多有猜忌,并严加监督,甚至一再想废掉孝文帝。《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载:“文明太后以帝聪圣,后或不利于冯氏,将谋废帝。乃于寒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朝,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元丕、穆泰、李冲固谏,乃止。帝初不有憾,唯深德丕等。”<sup>①</sup>这里所载冯氏欲废孝文帝事,“帝初不有憾,唯深德丕等”,《魏书》卷一〇五《天象志三》亦有相关记载:“是时冯太后将危少主数矣。帝春秋方富,而承事孝敬,动无违礼,故竟得无咎。”史家称孝文帝“时以文明(太后)摄事,优游恭己,玄览独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标,固以符于冥化。”<sup>[3]</sup>卷七《孝文帝纪下》“史臣曰”可见,孝文帝自幼受到冯太后的严厉控制,尽管极力隐忍克制,但依然不断受到猜疑和迫害。

考察相关史实,冯太后虐待、监督孝文帝的情况颇为严重。如她在孝文帝身边安排宦者监督其言行,《魏书·高祖纪下》载:“宦者先有谮帝于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数十,帝默然而受,不自申明。”由于冯太后猜疑孝文帝,不仅专职监督的宦者出于讨好冯氏而一再陷害孝文帝,甚至内廷的官员也有投机取巧者,《魏书》卷五八《杨播传附杨椿传》载杨椿言:“北都时,朝法严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并居内职,兄在高祖左右,吾与(杨)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时口敕,责诸内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间传言构间者。”杨椿兄弟相诫曰:“今忝二圣近臣,母子间甚难,宜深慎之”,因而十多年间,“及二圣间言语,终不敢辄尔传通”。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帝接见杨椿时谓诸王曰:“北京之日,太后严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语。和朕母子者,唯杨椿兄弟。”从孝文帝所言“和朕母子者,唯杨椿兄弟”,可见当时大多数内廷官员都有“传言构间”的情况。

不仅如此,冯太后为了进一步控制孝文帝,利用北魏“子贵母死”的旧制,将其生母与外亲戚属进行斩草除根式的清理。《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载:“迄后(指冯太后)之崩,高祖不知所

① 《魏书》卷二七《穆崇传附穆泰传》也载此事曰:“初,文明太后幽高祖于别室,将谋黜废,泰切谏乃止。”

生。至如李诉、李惠之徒，猜嫌覆灭者十余家，死者数百人，率多枉滥，天下冤之。”原来，孝文帝的亲生母亲献文思皇后李氏为冯太后所杀，冯氏加以隐瞒，致使“高祖不知所生”。李惠则为李皇后的父亲，即孝文帝的外祖父，其家族也多受牵连遭屠戮。其实，孝文帝的父亲，即献文帝拓跋弘也为冯氏所害。献文帝执政时与冯氏发生矛盾，年仅18岁便让位给只有5岁的儿子孝文帝，自称“太上皇”，颇令人费解，《魏书·天象志三》便说：“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献文帝对冯氏的行为不满，《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载：“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显祖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

冯太后长期凌驾于北魏皇权之上，在生前确定自己死后的陵墓、葬礼等，其行为也明显地对抗、破坏相关礼制。《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载孝文帝根据冯氏之意“诏有司营建寿陵于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将终为清庙焉。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颂太后功德”。冯氏不陪葬其夫文成帝，显然不合礼制，李凭先生以为“文明太后不但能将当时的皇上孝文帝玩于股掌之上，而且也不把孝文帝的祖父文成帝即她的夫君及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放在眼里。”<sup>[5]262</sup>更为出格的是，当时孝文帝的寿陵竟屈尊沦为冯氏陵墓的陪衬，《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载：“初，高祖孝于太后，乃于永固陵东北里余，豫营寿宫，有终焉瞻望之志。及迁洛阳，乃自表瀍西以为山园之所，而方山虚宫至今犹存，号曰‘万年堂’云。”可见孝文帝的寿陵实际上只是冯氏陵墓的陪葬。李凭先生根据考古发掘的材料指出：“同在一山的永固陵和万年堂适成鲜明的对比，文明太后之陵工程浩大，制度逾常；孝文帝的寿宫则相对较小，缺乏帝王气派：这正反映了两人生前的控制与从属的关系。”<sup>[5]264-265</sup>这不仅对孝文帝个人而言，而且对整个拓跋氏皇族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羞辱。对此，李凭先生指出：“后事的安排正是生前生活的写照。永固陵的位置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它处于御河上游的两条支流之间的高阜之上，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脚下依稀可见的平城宫建筑，正象征着文明太后生前驾驭平城政权的威势。”<sup>[5]265</sup>

冯太后死后，孝文帝极尽孝道，历代史家对此颇为不解。冯氏害死孝文帝父亲献文帝，但孝文帝主政后，并没有为父复仇，以致史家讥其“昧于《春秋》之义”。《魏书·天象志三》便说献文暴崩，

“实有鸩毒之祸焉……其后文明皇太后崩，孝文皇帝方修谅阴之仪，笃孺子之慕，竟未能述宣《春秋》之义，而惩供人之党。”对于孝文帝“奉冯氏过厚，于李氏过薄，舅家了无叙用”的状况，当时朝野便颇多议论，历代史家更质疑孝文帝不为其母族复仇。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六六“孝文帝孝事文明太后”条中也对孝文帝与冯太后的关系提出疑问，如说“献文帝杀其所私而行弑逆，则恩义已绝，孝文帝当思谁杀我父，谓宜告于宗庙，发而诛之，乃犹奉事不懈，孝谨有加，孝文帝孝而过者也，且孝而愚者也”。冯太后死后，孝文帝追为美谥曰“文明太皇太后”，“盖因其临朝日久，直待以帝礼，且因其粉饰文治，特为造此美谥，此其不可解一也”；冯氏亲自抚养孝文帝，“迄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是孝文当日直以母道事之，此其不可解二也”；冯氏死后，孝文帝极尽苦孝之道，“忘杀父之仇而行如此过情之礼，此其不可解三也”；“冯氏一淫乱妇人，前后临朝几三十年，终不归政，而孝文帝亦竟不敢与闻政，直至冯氏崩后，犹闇嘿自居，自称哀慕缠绵，心迷神塞，未堪自力亲政，使近侍掌机衡者任之，逾年始听政于皇信东室，此其不可解四也”；冯太后葬后，孝文帝“初葬一月中谒陵者三，逾年一年中谒陵者四，频数至此，第三年之正月犹悬而不乐再周，忌日犹哭于陵左，绝膳三日，哭不辍声，此其不可解五也”。王氏以为冯太后面首甚多，且位高权重，“淫恣如此，孝文不但听之，且哀慕过礼如此，盖魏之家法多出人情之外……魏家法非理，古所少也”。吕思勉先生针对孝文帝敬奉冯氏的诸多不可解之事，以为孝文帝可能是冯太后的私生子<sup>[2]508-510</sup>。

不过，历代史家的质疑属猜测，难免书生意气。仔细体悟，当不难理解孝文帝当时的处境。冯太后在世时，孝文帝受其控制，难有作为。即便在冯氏死后，她长期执政所积累的威望，特别是在朝廷内外所布置的亲信嫡系，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孝文帝亲政之初，根本无法改变这一状况，他只有继续恪守隐忍之道。这样一种人生经历，绝非常人所能承受。这种遭遇，对孝文帝固然不幸，但也是一种人生的磨砺，使他体会到了政治的险恶和无情，从而锻炼了他的意志与品格，掌握了不少从政的谋略与智慧，而这些都是一个承平之主很难具备的素质。从心理角度说，孝文帝的隐忍、坚毅等性格特征的形成，正与这种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其实，孝文帝对其自幼受制于冯氏的

遭遇,内心深处极为痛苦,并在情感上有曲折、隐晦的表现。从前引孝文帝迁都后谓杨椿言“和朕母子者,唯杨椿兄弟”,并向其兄弟敬酒的举动看,正是其某种情感的流露。又,前引称孝文帝面对冯氏的废黜之议,“帝初不有憾,唯深德(元)丕等”,也是如此<sup>①</sup>。因此,对于孝文帝来说,无论是他企图建立功业,还是个人情感的抒发,都必须离开平城。因为对于孝文帝而言,平城象征着冯太后的威望,这给孝文帝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他迁都洛阳之后,立即“乃自表瀍西以为山园之所,而方山虚宫至今犹存”,显然是要摆脱冯太后的阴影。孝文帝迁洛后,对冯氏家族的态度也有所变化,如冯太后弟冯熙死于平城,孝文帝不去平城奔丧,这固然由于其率师南征难以脱身,但其中也难免有其情感因素。特别是在洛阳期间,孝文帝对被立为皇后的冯太后的二位侄女,一个废黜,一个幽禁,并在自己临终前下令处死,这其中也隐含着某种对冯氏家族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

由此而言,为摆脱平城旧宫梦魇生活的记忆,更为了摆脱冯氏势力的控制,孝文帝在完成居丧三年的礼制规定后,于太和十七年(493年)开始谋划迁都事宜,至太和十九年,完成了迁都大业。究其原因,李凭曾分析指出:“北魏的迁都是势在必行之事,但其所以会进行得那么快,是与孝文帝决心之大分不开的。而孝文帝之所以能那么快地下定迁都的决心,则是与他的个人情绪分不开的……帝王虽然身份特殊,毕竟也是有血有肉之人,而太和十七年北魏迁都洛阳之际的孝文帝才是一个虚岁 27 岁的青年,个人情绪难免会成为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孝文帝能够在文明太后去世后很快地作出义无反顾的决断,则与他个人的情绪是有很大关系的。自从文明太后去世三年以来,皇权虽然重新伸张了,但是母权的阴魂未散,文明太后的势力尚能制约政局。孝文帝正是为了尽快摆脱这种旧的氛围,才迫不及待地作出了迁都的决断……生不能继续忍受母权阴影的笼罩,死不愿葬入文明太后陵侧的陪陵,孝文帝个人的感情因素无疑是北魏迁都洛阳的催化剂。”<sup>[5]272-274</sup><sup>②</sup>

综合上述,从孝文帝个人的超乎寻常的汉文化修养、急于寻求进入儒家先圣正统行列和摆脱平城母权阴影等三个方面,叙述了北魏孝文帝迁

都洛阳的个人主观因素。确实,不可否认北魏迁都固然牵涉北魏政治、军事、经济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有其必然性,但从孝文帝迁都过程中北魏保守势力激烈对抗的情况看,如果没有孝文帝的决断,甚至不惜大义灭亲以坚定不移地维护南迁成果,那迁都依然是很遥远的事。众所周知,在历史发展与变革的重大关头,统治者个人的主观愿望、态度及其决策,或积极,或消极,或主动,或被动,或自觉,或不自觉,或超前,或滞后,这都会直接影响到历史发展与变革的进程,值得重视。具体就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而言,孝文帝个人的汉文化修养、追求正统的愿望及其心理状态等,无疑成为其断然决策并坚定不移地加以实施的重要催化剂。

#### 四、余论:北魏孝文帝迁都及其汉化之得失

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创了北魏历史发展的新时代。当时,孝文帝南征萧齐,力图实现统一,同时全面实施汉化政策,促进民族融合。作为杰出的统治者,孝文帝自然会为北魏王朝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发展作出长远和根本的考虑。不可否认,孝文帝迁都具有浓郁的个人色彩,鲜卑拓跋部内部反对者甚众,分化和冲突日益加剧。那么,究竟如何认识孝文帝迁都及其汉化政策之影响及其得失呢?这是与论述孝文帝迁都紧密相关的问题。

(一)从华夏民族融合的整体进程看,应该充分肯定其深远的历史作用与影响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及其全面汉化,就其根本而言,是出于其对华夏文明的仰慕,决意将鲜卑民族与作为华夏文化主体的汉族融为一体,实现彻底的民族融合。孝文帝的汉化,并非心血来潮,也非其特创。汉化是北魏的一贯政策,从鲜卑接触到汉文化那天开始,他们就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汉化的道路,汉化就成为北魏社会变革的中心议题。在北魏前期,由于民族本位意识,他们自觉的反汉化意识十分强烈,而汉化处于不自觉的状态。然而,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文化的民族之间的

<sup>①</sup> 李凭先生在《北魏平城时代》中就此分析指出:“这都说明他并没有忘记往事。既然有‘深德’,也必定有深恨。”(第 270 页)此说甚是。

<sup>②</sup> 从个人情感的角度论述孝文帝迁都之动因,这是李凭先生的创见,本文写作中多有参考,深表谢忱之意。

交往,那些以野蛮的军事武力方式取得统治地位的民族,或早或迟最终都难以避免被那些在文化与经济水平等方面处于先进地位的被征服者所改造,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北魏孝文帝继承了此前许多鲜、汉变革者的遗业,以其非凡的勇气、魄力,矢志不渝地推行鲜卑族的全面汉化改革,将北魏的汉化运动推向了高潮。他的一系列汉化举措,使得鲜卑族上层与汉族上层融为一体,使鲜卑族的主体部分融入到华夏民族的大家庭之中。这是对十六国以来北方民族融合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尽管孝文帝尚未完成民族融合的全部过程,但其所遗留的民族问题已不能改变历史的正确走向,此后北朝后期、隋、唐的历史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沿着孝文帝开辟的道路前进的。

孝文帝的汉化变革不仅对北朝及隋、唐历史有一脉相承的影响,而且应将眼界放宽一些,从华夏文明发展的全局来把握。我们知道,自汉魏以降,特别是西晋以后,诸胡南进,铁骑纵横,中原土族南迁,华夏文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长期的南北分裂与对抗,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东晋南朝虽具有文化上的正统地位,但军事上的羸弱注定其无法承担未来统一南北的历史重任。北魏孝文帝个人汉化修养极高,后来的儒者赞其为“天人”,他自觉地追求华夏正统文化,并决意将全体民族融入这一文化之中。

孝文帝迁洛后全面汉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法南朝,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事例是通过王肃转输南朝文化。王肃为江东一流士族琅邪王氏子弟,因卷入南齐政治斗争而北奔,太和十七年,孝文帝在邺城接见他,虚襟相待,彻夜长谈。之所以如此,孝文帝借重他以引进保存于江左之华夏正统文化。《北史》卷四二《王肃传》载:“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釐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自肃出。”琅邪王氏为中古时代第一文化盛门,世代传承礼乐典制,王肃“必经受其宗贤之流风遗著所熏习,遂能抱持南朝之利器,遇北主之新知”,从而将“南朝前期发展之文物制度转输于北朝以开太和时代之新文化,为后来隋唐制度不祧之远祖”<sup>[1]16,15</sup>。政治、社会制度如此,孝文帝在思想文化其他诸多领域也重视南朝文化风尚,造成北朝文化诸多新风尚,所谓“衣冠仰止,咸慕新风”<sup>[3]卷八五《文苑传序》</sup>显现了南朝化文化风尚的传播与影响程度。孝文帝在文化上的汇通南北,大量

汲取南朝文化,不仅补充了北朝文化的缺失,更有助于消除南北歧见,进而从文化这一根本上构筑南北统一的基础。此后,隋、唐王朝不仅沿袭了孝文帝的制度文化成果,而且继承了他整合南北文化的基本思路,开创了更加辉煌的文化局面。

孝文帝在民族观念上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他反对狭隘的民族本位意识。他曾说:“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sup>[3]卷七《高祖纪下》</sup>他是主张对各民族“均诚”的。他的政治理想是追踪儒家先王、先圣。他汇通南北文化,使洛阳成为新的华夏文化中心,甚至连一贯以民族观念歧视北朝的南人也由衷地表示赞赏。如陈庆之曾至洛阳,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他本人“羽仪服式悉法洛阳,江左士庶竞相模楷,褰衣博带,被及秣陵”<sup>[6]卷二</sup>。确实,孝文帝的制度改革与文化创新对南朝是有所反馈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孝文帝汉化的影响。

因此,孝文帝迁都及其汉化政策,从北魏社会发展与当时民族融合的大趋势来说,无疑是顺应了历史演进规律的;不仅如此,从更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看,孝文帝迁都后大力倡导汉化,输入南朝文化,其影响远甚于其军事上之企图混一南北。不能不承认,长期的南北分裂,其根源在于民族之对立与文化之冲突。这一问题直到唐代才得以比较彻底地解决,但孝文帝之相关举措,无疑是其进程中的重要环节。

## (二)迁都洛阳加剧了鲜卑拓跋部的分化与弱化

孝文帝急于迁都及其汉化,其中既包含着浓郁的个人色彩,且诸多举措颇为激进,这必然加剧鲜卑民族的内部分化,对北魏王朝兴衰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汉化变革是孝文帝人生的最大追求。但就整体而言,鲜卑民族的保守势力根深蒂固,反对迁都、抗拒汉化的旧贵族人数颇多,力量甚大。《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东阳公丕传》载其为鲜卑元老势力的代表,其父子“大意不乐迁洛”,“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洛,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这绝非个别的人的态度,史称“人情恋本,多有异议”<sup>[3]卷三一《于烈传》</sup>。一些极端保守的鲜卑旧贵族,在迁都过程中则不断制造事端,甚至在代北发动军事政变,如穆泰、陆

睿等人,其背后的精神支柱实际上是元丕,而孝文帝太子元恂也不赞成迁都,参预谋反,一度谋划北奔。《魏书》卷三一“于烈传”载:“是逆也,代乡旧族,同恶者多,唯烈一宗,无所染预。”可以说,以孝文帝为代表的南迁集团与代北保守势力公然决裂了。确实,孝文帝个人自觉的迁都愿望及其急切的汉化举措,与整个鲜卑社会相比,表现出明显的超前性。因此,尽管其利用决策权而断然实施,但必然留有后患,引起鲜卑上层内部的严重分裂与冲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魏的统治基础。

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帝厉行全面汉化,他所面临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稍有生活阅历与经验的人都不难理解,在社会变革过程中,诸多环节不仅需要执政者的热情与魄力,而且需要一定的过程与时间的消耗。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年仅33岁的孝文帝病死于南征的前线。当时的汉化运动正在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这都需要通过更深层的改革来克服,以免出现严重的危机。但对于孝文帝个人而言,这些只能是永远无法释怀的遗憾了。不可否认,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政策因未及深入和完成,遗留问题不少,负面效应明显。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他分定姓族,使鲜卑宗室贵族等成为一个特权阶层,在汉化改革过程中获得了最大利益,与鲜卑民族中的其他阶层形成了严重的分化和对立。《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述当时“帝室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夸”,他们甚至与腐朽的西晋王公相竞,声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以奢侈相骄。这一状况,恐怕出乎孝文帝的预料,也绝不是他全面汉化的初衷。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未能南迁的代北旧人,特别是以六镇为中心的戍边军事集团,在汉化改革后被排除在新的门阀体制之外,“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sup>[3]卷一八《太武王·广阳王深传》</sup>,这样,洛阳汉化集团与六镇集团,形成文武之别和清、浊之辨,地位悬殊,利益冲突,其势必如水火。这些边关镇兵具有军事组织,力量强大,塞外部民亦如此。这对洛阳汉化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孝文帝对此是有警觉的,他曾表示要着手解决,消除统治危机。遗憾的是他去世过早,而其后继者则毫无建树,任其发展,最终引发了六镇变乱。

其实,即便随迁洛阳的鲜卑人口,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具有特权的也只是少数,大部分鲜卑下层

变为庶民,孝文帝曾下诏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充任洛阳禁卫军,但在门阀制度下,这些羽林、虎贲之士难免受到歧视,地位下降,“时天下无事,进仕路难,代迁之人,多不沾预”<sup>[3]卷八一《山伟传》</sup>,他们对现状极为不满。孝明帝时,汉族人士张彝“爱好知己,轻忽下流”,其子张仲瑀“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由是众口喧喧,谤讟盈路,立榜大巷,剋期会集,屠害其家”。后羽林虎贲近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不获,以瓦石击打公门。上下畏惧,莫敢讨抑”,以致将张始均烧死,“远近闻见,莫不惋骇”。洛阳羽林武人不满意现状,公然制造祸乱,朝廷则息事宁人,“有识者知国纪之将坠矣”<sup>[3]卷六四《张彝传》</sup>。陈寅恪先生说:“洛阳羽林虎贲起来发难,实际是六镇起兵的前奏。”<sup>[7]279</sup>孝明帝正光年间,戍守六镇的兵户相继叛乱,北魏朝廷无力镇压,只有依靠北秀容川的酋帅尔朱荣势力。尔朱荣虽在军事上镇压六镇,但在文化上与六镇一样敌视洛阳汉化集团,故尔朱荣进入洛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河阴之变”,残酷杀戮王公卿士。六镇鲜卑化军人反汉化集团的目的,由尔朱荣之手得以实现了。关于六镇之乱及相关事件之性质,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孝文帝之后,北魏出现洛阳汉化与六镇鲜卑化两大集团,“自宣武以后,洛阳之汉化愈深,而腐化乃愈甚,其同时之代北六镇保守胡化亦愈固,即反抗洛阳之汉化腐化力随之而益强,故魏末六镇之乱,虽有诸原因,如饥谨虐政及府户待遇不平之类,然间接促成武泰元年四月十三日尔朱荣河阴之屠杀实胡族对汉化政策有意无意中之一大表示,非仅尔朱荣、费穆等一时之权略所致也。”<sup>[1]47-48</sup>他认为这是“中古史划分时期之重要事变”<sup>[8]197</sup>。尔朱荣之后,六镇兵士分别为高欢、宇文泰所控制。尽管鲜卑旧俗一度反潮回流,汉化受阻,但六镇势力一旦进入河北、关中,终究难以抵挡汉化的必然趋势。

对孝文帝迁都洛阳,鲜卑保守势力竭力反对,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一旦离开塞北,鲜卑族会丧失尚武精神和战斗力。《魏书》卷七八《孙绍传》载宣武帝正光年间孙绍言:“往在代都,武质而治安;中京以来,文华而政乱。故臣昔于太和,极陈得失,具论四方华夷心态,高祖垂纳,文应可寻。延昌、正光,奏疏频上,主者收录,不蒙报问,即日事势,乃至于此,尽微臣豫陈之验。”孙绍主张“武质而治安”、“文华而政乱”,他认为这是造成平城、洛阳治乱相异的缘由。他自称在太和年间便曾上书孝文



帝，“极陈得失”，如属实，当在迁都之后。

历代史家中，尤以宋代叶适对孝文帝迁都批评得最为激烈，几乎全盘否定，以为此举促成北魏的衰亡，《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四《魏书·序纪》条有论云：“诸胡乘晋乱迭据中土，极强盛者不过数十年，纷纠腾突，徒互为废兴而不足以定事。盖华夷地势不同，习俗亦异，统御不一，彼此不安，亦其势然也。惟拓跋迁都平城，纯用胡法控勒诸夏，故最为长久。孝文慨慕华风，力变夷俗，始迁洛邑，根本既墟，随即崩溃，亦不过数十年，天下复还中国之旧矣。然则用夏变夷者，圣人之道也，以夷制夏者，夷狄之利也；失其利则衰，反其常则灭；乌得谓‘黎民怀之，三才其舍诸’！盖书生之浮论也。”又，同书同卷《魏书·文成文明皇后传》条中说：“孝文都洛最无谓……孝文自合更为其国开百余年深厚之业，岂谓一迁洛而本根浮动，坟庙宗族，皆已弃绝，边徼镇戍，单寒无依？向非孝文，便当身见祸乱；然亦竟十余年而国为墟矣。盖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其害至此。后之学者，又将誉之不已，是以亡为存，以败为成，乌在其言王道也！”又，同书同卷《魏书·文成文明皇后传》条中说：“魏亡之祸，成于六镇；轻薄六镇，实自太和。夫变夷从夏，人孰不以为美？至一家门户紧切利害，乃忽弃不顾，可乎？”这都明确指出孝文帝迁洛致使鲜卑丧失了战斗力，促成北魏内部的分裂与衰亡。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四“魏孝文迁洛”条中也以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国势之衰实始于此，一传而宣武，再传而孝明，而鼎祚移矣。盖徒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渐弛也。”所谓“徒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渐弛”，这确是历代南迁胡族的通病和悲剧。北魏之所以能避免十六国北朝诸多内迁胡族骤兴骤亡的命运，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鲜卑拓跋部之主体长期居于塞外，保持着游牧民族的作风。但南迁洛阳，鲜卑上层掉进了温柔之乡，丧失了平城时代的朴素传统和尚武精神，以致为野蛮的六镇集团所

击溃。

不过，以上看法主要局限于对迁洛问题的具体考察，是就事论事的简单化判断，有以偏概全的倾向。如果将孝文帝汉化改革作为整个中古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环节来看，我们可以说，塞外善战的少数民族不断进入中原与汉族融合，这是当时民族融合的必然趋势，孝文帝正是顺应这样的趋势。对于孝文帝汉化政策的是非得失，吕思勉先生曾有论云：“南迁之计，于虏为损乎？为益乎？……谓武质而安，文华而乱，固已曲尽事情，离乎夷狄而未即乎中国，固不免有此祸。然遂终自安于夷狄可乎？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人如是，一族亦然。乌飞准绳，岂计一时之曲直？是则以一时言，南迁于虏若为害，以永久言，于虏实为利也。孝文亦人杰哉！”<sup>[2]518</sup> 吕先生所论言简意赅，将民族融合的终极规律与鲜卑民族盛衰的命运结合起来，这是比较公道和深刻的论断。

#### 参考文献

- [1]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 [2] 吕思勉. 两晋南北朝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3] 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 逯耀东. 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G]//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5] 李凭. 北魏平城时代[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6] 杨衒之著，杨勇校笺. 洛阳伽蓝记校笺[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7] 万绳楠.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 合肥：黄山书社，1987.
- [8] 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责任编辑：喻世华）

（下转第22页）

- [9] 朱亚宗. 老子科技观述评兼与李约瑟先生商榷[J].  
船山学刊, 1995(1), :101—128.

(责任编辑: 喻世华)

## Research o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houghts of Lao Zi

CHEN H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China)

**Abstract:** Lao Zi's concept of nature as his scientific thinking fundament includes natural philosophy based on "Dao", Universe Formation Theory and cycle theory of universe. "Dao" is the basis of the universe and has the interaction of two opposite factors and three major laws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The technology ideas of Lao Zi include: administration must conform to the integrity of the law, existence must go together with nonexistence, refle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mind and the objects, anything difficult can only be achieved from easy ones and anything big can only be achieved from small ones, which provides strong guidance not only for engineering design, but also for national affairs and domestic problems.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houghts of Lao Zi achieve a combination of reductionism and holism, and the combination of Heaven and human beings means the combination of 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Lao Zi;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houghts; Research

(上接第 9 页)

## On Personal Factors of Emperor Xiaowen of Northern Wei Dynasty to Move the Capital to Luoyang

WANG Yongping

(Dept. Of History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2, China)

**Abstract:** The reasons of Emperor Xiaowen moving the capital to Luoyang not only involves some objective factors: political, military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factors, but also involves Emperor Xiaowen's subjective factors: his fascination with Chinese culture, his strategy to take over the south, his pursuit of the orthodox position and his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 and emotions. The moving and the assimilation by the Han both speeded up the national integration of Xianbei people and the Han people and also to some extent caused the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group who moved to Luoyang and the conservative group of Heng and Dai. And the continuous weakening of the group who had moved to the South accelerated the weakening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Key words:** Emperor Xiaowen; moving the capital; Luoyang; personal factors; influence